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三卷)

[明] 阳明后学

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上)

——泰州学派·浙中王学·南中王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65
:1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三卷)

[明] 阳明后学

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上)

——泰州学派·浙中王学·南中王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39-6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8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明] 阳明后学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上)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39-6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100种、外国卷100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200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年4月



上 篇

王艮与泰州学派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论著选读

王艮生平及其思想性格	(1)
(一) 自学时期(三十七岁以前)	(2)
(二) 从学时期(三十八岁至四十六岁)	(7)
(三) 讲学时期(四十七岁至五十八岁)	(13)
泰州学派的学术特色	(16)
(一) “百姓日用之道”	(17)
(二) “淮南格物”	(22)
(三) “王道论”	(27)
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	(30)
(一) 民本思想:平民意识之理论渊源	(31)
(二) 时代需要:平民意识萌发的现实前提	(33)
(三) 平民意识: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	(35)
龙溪学派和泰州学派	(38)
左派王学	(39)

泰州诸儒思想的发展趋势及其时代意义	(51)
王艮的教育思想	(58)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	(63)
王艮教育文论选读	(69)
复初说	(69)
安定书院讲学别言	(70)
明哲保身论赠别瑶湖北上	(70)
勉仁方书壁示诸生	(72)
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	(74)
王道论	(74)
尺牍密证(节选)	(78)
答邹东廓先生	(79)
答徐凤冈节推	(80)
语录(节选)	(83)
《宋元学案·泰州学案》选读	(84)
处士王心斋先生艮	(90)
心斋语录	(93)
《安定书院讲学语录》选读	(99)
语录	(99)
复初说	(114)
安定书院讲学别言	(114)
明哲保身论(赠别瑶湖北上)	(115)
勉仁方(书壁示诸生)	(116)
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	(118)

答问补遗(计二十一节)	(119)
-------------------	-------

中 篇

阳明后学——浙中王学与南中王学 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浙中王畿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131)
(一)王畿的理学	(131)
(二)王畿的教育思想	(142)
王畿教育文论选读	(147)
与孟两峰书(节选)	(147)
赠邑博诸元冈迁荆王府教授序	(148)
思学说	(149)
时学元习说	(150)
浙中钱德洪、张元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	(151)
(一)钱德洪的理学思想	(151)
(二)钱德洪、张元忬等“主事派”的教育思想	(156)
钱德洪教育文论选读	(162)
论学书(节选)	(162)
会 语(节选)	(165)
《宋元学案·浙中王门学案》选读	(170)
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	(170)
会 语	(172)

论学书	(179)
郎中王龙溪先生畿	(183)
语 录	(185)
论学书	(201)
调息法	(205)
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忬	(206)
不二斋论学书	(207)
南中王门薛应旗的教育思想特色	(212)
(一)薛应旗的生平、师承和著作	(212)
(二)薛应旗的心学思想及其矛盾	(214)
(三)薛应旗的《致良知说》与《正己格物》论	(219)
(四)薛应旗的务实思想	(222)
南中唐鹤征《桃溪札记》及《易》学思想特色与教育观念	(225)
(一)唐鹤征的生平、师承及著作	(225)
(二)唐鹤征的宇宙生成论	(226)
(三)唐鹤征的心性说	(228)
(四)唐鹤征的认识论	(231)
(五)道家思想对唐鹤征的影响	(233)
《宋元学案·南中王门学案》选读	(236)
提学薛方山先生应旗	(236)
薛方山纪述	(236)
副使薛畏斋先生甲	(237)
薛畏斋文集	(238)

副使查毅斋先生铎	(239)
查毅斋先生集	(240)
太常唐凝庵先生鹤徵	(244)
桃溪札记	(246)

王艮与泰州学派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论著选读

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后世学者多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着眼,将泰州学派归入王学统系。当今学术界也有所谓“王学左派”,“王学右派”诸说。我们认为,考察思想上学派的分合异同,注意学派间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都是必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作为学派代表者的思想家本身的思想内容、特点和社会影响。以此而言,泰州学派的开创人王艮虽曾和王守仁有过师生关系,其学术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深受王学影响,但他的主体思想与王学很不相同,乃至违异。正因为如此,泰州学派才能成为一个有别于王学的独立学派。实际上,黄宗羲早已看到这一点。他在《明儒学案》中,将王守仁的众多弟子按地区分别列入“王门”(如“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等),却为王艮另立“泰州学案”,指出王艮及其后学的“异端”色彩。本章着重考察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联系和区别。

王艮生平及其思想性格

王艮(公元1483—1541年)^①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著作经其子孙门人陆续收集整理,编成《心斋王先生全集》^②。

① 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六月丁丑(十六日),即公元1483年7月20日,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六日,即公元1541年1月2日。今人多因旧历定其卒年为1540年,不确。

② 据耿定力、丁宾、焦竑、陈应芳、蒋如莘等《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所记,王艮著作刊刻情况如下:门人吴标、王汝贞、罗楫、董高、聂静及王衣、王璧兄弟五人初刻《谱录姓氏》;兵道蔡国宾刻《粹语》。门人张峰(知县)初刻《遗录》于江浦,继刻于义阳书院;门人董燧、聂静、吴标、王贞等重刻《年谱语录》;王栋三刻《遗录》于姜堰镇;扬州府推官吴一桂、泰州知州陈仁四刻《谱录》于海陵。耿定力等五刻《全集》于海陵。又据袁承业记,继五刻本后,又由焦竑、周汝登等人校刻,即六刻本。

清嘉庆间,王氏后裔搜访遗版,合其族弟、门人王栋,子王骥著作,汇印成《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重新编订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王艮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无所师承的自学期;(二)依傍王门的从学时期;(三)“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下面,我们依此对王艮生平活动及其思想性格做简要的叙述。

(一) 自学期(三十七岁以前)

王艮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的家庭。在封建制社会,灶户是国家对盐业生产者进行户口编制的特称。由于食盐生产过程较为复杂,从海水提炼成盐,往往需要设亭立灶进行煎熬,所以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被称为“灶丁”或“亭子”、“亭丁”;占有灶籍者,则称为“灶户”或“亭户”。按照明朝的规定:“每盐场有团有灶,每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朱廷立《盐政志》卷四)凡被编入灶户的灶丁,年满十五岁开始“办课”,即按规定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产品,直到六十岁方可“优免名盐”(同上卷十嘉靖四年两淮御史张珩《禁约》)。灶丁不但“拮据裸体,劳筋苦骨”(同上卷七嘉靖九年两淮巡盐御史李士翱《盐法疏》),为封建国家“办课”,而且还要承担官府的种种杂役。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往往引起灶丁的逃亡。嘉靖年间,监察御史朱廷立在《盐法疏》中说:“灶丁煎办之苦,有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穷灶嗷嗷,无所仰赖,如之何不流移也?”(同上)封建国家为了防止灶民逃亡,不但依靠法律手段(还加上封建道德约束)来强制灶民生产,还采取超经济手段不断补充劳动人手。灶丁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所谓“罪情深重”的囚徒;二是朝廷“行有司金补”,即将平民充作灶户。王艮的灶户家世属于后一方面。据王之垣(王艮的长孙)在《世系详注截略图》引言中所述,他们的始祖王伯寿在洪武年间依诏令“自姑苏(今江苏

苏州)徙淮南安丰场”(《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以下《王心斋全集》简称《全集》)。王伯寿的儿子国祥即“占灶籍,煮海”(同上《世系详注截略图》),直至王艮及其儿子们“俱系安丰场灶籍”(同上卷五王衣、王裳等《优免帖文》),除“应办盐课”外,还必须负担亭丁身份的杂役。王艮本人就曾“以身代役”,替他父亲去从事官府的徭役。

在明中叶,两淮一带灶户中有贫灶富灶之分,而王艮的家庭是一个贫苦的灶户。据《全集·年谱》记载,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至十一岁,“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书,王艮只好跟随父兄参加劳动,养家糊口。泰州守张骥说:“先生(王艮)初固亭子也”(《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以下简称《遗集》)。凌儒所撰王艮《祠堂记》说:“吾乡心斋王先生本农家子,生长灶间,年三十才可识字。”(同上)李贽也说:“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焚书》卷二《书答·为黄安二上人太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0页)王艮从一个灶丁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创始人,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一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概括地说,是一条由灶丁而商贾而学者的道路。经商使王艮得以摆脱家境贫困,为他通向学者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据《年谱》记载,王艮十九岁时,奉父命“商游四方,先生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二十一岁,“先生家居,经理财用。始事时,人多异之;及措置得宜,人复以为不能及。自是先生家日裕”。二十三岁,“客山东。先生有疾,从医家受倒仓法。既疾愈,乃究心医道”。徐玉璠撰《王艮传》说:“弱冠,先生父纪芳使治商,往来齐鲁间。已,又业医。然皆弗竟。”(《遗集》卷四)看来,经商、行医都是王艮的生财之道,加上他善于“经理财用”,家道也就日渐富裕起来了。

但是,王艮经商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贩运私盐?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均已阙如。“安丰俗负盐,无宿学者”(《全集》卷五赵贞吉《王艮墓铭》)。王艮的家乡是个盛产食盐的地方,盐商纷至,当时被官

府定为“上场”^①。明朝政府是严禁贩运私盐的^②。尽管官府禁令森严,但由于封建吏治的腐败,两淮私盐仍然非常盛行。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都御史张缙在《两淮盐禁疏》中说:“私盐之弊,固非一端,而私煎尤为弊首。今严于私贩而略于私鬻。……缘盐徒老商,交通豪灶,离团煎鬻,小人得利,更相效尤。私盐肆行,官课渐损。此辈多濒海滨,及军民豪势之流,根蕃蔓结,分司点视不常,巡官虚应故事。”(郭廷立《盐政志》卷七)其实,私贩亦未因朝廷厉禁而或稍息。嘉靖初,霍韬在《淮盐利弊议》中说:“贫民卖私盐,人即捕获;富室卖私盐,官亦容忍。故贫灶余盐,必借富室乃得私卖。富室豪民,挟海负险,多招贫民,广占卤地,煎盐私卖,富敌王侯。故禁愈严,富室愈横,此之由也。”又说:“在两淮、通、泰、宝应州县,民厌农田,惟射盐利。故山阳之民,十五以上俱习武勇,气复强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几至大变。故淮安官军,不惟不捕私盐,且受饵利,而为之护送出境矣。山东官军,不惟不捕私盐,反向盐徒丐盐充食矣。盐徒千百,日挟白刃径行,州邑官兵不敢谁何矣。”(同上)这里所描述的情形,不禁使人联想起王艮“同里人商贩东鲁间”(《遗集》卷四耿定向《王艮传文》)的活动,岂不正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和同一时期吗?如果据此说王艮曾同他家乡的人结伙贩运私盐,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王艮死后,黄直在《奠文》中说到他“世居安丰,晦迹舟航”(《全集》卷五)。这也暗喻他早年是一个由水路进出的行商。

在我们看来,王艮这一段经商发家史却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

①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两淮巡盐御史朱冠奏请“以富安、安丰……四十三场定为上等”、“盐课略多”(郭廷立《盐政志》卷七)。

② 据戴金《盐法疏》引《大明律》: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军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又:豪强盐徒,聚众撑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者,官兵寻防捕捉,若拒敌杀伤人命者,俱梟首示众。(同上)又:弘治年间奏准:惟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不必拘捕。(同上卷四)

表明王艮本身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他由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其次,正因为王艮是由经商转向治学的,因而在他思想学说的某些方面(甚至包括哲学理论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商人的气息,带有封建社会晚期城市中等阶级的平民色彩。

王艮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终身为陶朱公,而是要当新孔圣。王艮的得意门弟子徐樾为乃师作《别传》说:“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尚友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同上)《年谱》记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庙,“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同上卷二)王艮怀着要为“万世师”的愿望,发奋学习儒家经典,开始了他的自学时期。

王艮去见王守仁之前,自称他已“为学十年”(同上卷五徐樾《王艮别传》)。这十年,即指他二十七、八岁至三十七、八岁间,是他的自学时期。

在这个时期,王艮的治学特点是什么呢?大致有下述三点:

第一,“逢人质义”,学无师承

王艮出身灶丁,本来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而其家乡又“无宿学者”(同上赵贞吉《王艮墓铭》),是个缺少文化教育的地方,找不到有学问的老师。他“蒿游四方”,行踪不定,固定师门求学甚难,因此他不得不“逢人质义”,到处求教,当然也就无所师承了。王艮后来成为学者,和他这种“逢人质义”的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王艮晚年虽然“自立门户”讲学,可他并不怎么重视师教。王艮《语录》载:“有别先生者,以远师教为言。先生曰:‘涂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同上卷三)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以途人为师,不必谨守师教,也正是对他早年“逢人质义”自学方法的肯定,同时也说明王艮与那些拘守师门传统的正宗学者不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带有平民的色彩。

第二,“不泥传注”,“信口谈解”

《年谱》记:王艮三十二岁,“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注辨难者,即为解说。”(同上卷二)赵贞吉作《王艮墓铭》说:“先生逮粗识《论语》、《孝经》章句,即邀焉希如古圣贤人,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塾师无敢难者。”(同上卷五)这里所谓“不泥传注”,“信口谈解”,就是指王艮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文义,反对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代表的章句之学,主张“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同上),即不但要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而且要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显然,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学风。后来,王艮从“经传印证吾心”的主观唯心论出发,提出经传“何足用哉”(同上卷三《语录》)的思想,实际上贬落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王艮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不是没有道理的。

必须指出,王艮这种学风,一方面是他缺乏文化教养的表现。因为像他这样一个粗识文字的人是不可能通过章句之学登上儒学的殿堂的,而“信口谈解”则可以方便如意地在“圣贤”的名义下表达自己的思想,反映他所代表的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王艮这种学风又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变化相联系。在明中叶,随着封建官僚政治日益腐败,作为正宗思想的程朱理学也愈加暴露其腐朽性。为了挽救明朝的社会危机,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的一些封建士大夫力图复兴陆九渊的心学,用以取代程朱理学。自学时期的王艮虽然还不知道王守仁其人,但在他“逢人质义”时,是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广泛流行的陆王心学的濡染的。耿定向记述王艮此时的学术活动说:“(王艮)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学谕司成。司成使学徒问所治经。先生答曰:‘治总经也。’司成进与语,奇之,曰:‘此非吾所能与也,须遇越(浙江)王(守仁)先生始能成之。’”(《遗集》卷四耿定向《王艮传文》)王艮不满于章句之学及其“不泥传注”,“信口谈解”的学风,都和陆王心学有相通之处,这也是王艮尔后投向王守仁门下的思想契机。

第三,“默坐体道”,“以先觉为己任”

《年谱》记:王艮二十七岁,“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全集》卷二)。这种所谓“默坐体道”,固有表现王艮刻苦砺学的一面,但从认识论而言,则反映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王艮正是利用他悟道的神话,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以先觉为己任”的新教主的。据徐樾记述,王艮二十九岁时,“一夜,梦天坠压,万姓惊号”,他以手支天而起,民相欢呼拜谢。

他醒来“顿觉万物一体,视宇宙内一人一物不得其所,惻然思有以救之,与物无间。而前者浑然不二于日用者,今则自得自喻也。……乃毅然以先觉为己任”(同上卷五徐樾《王艮别传》)。不仅如此,王艮还“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绅经、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①。这种神秘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结合,构成了王艮的宗教式狂想曲。

(二) 从学时期(三十八岁至四十六岁)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王艮在自己的家乡闲居,当时有个名叫黄文刚的塾师,是江西吉安人。他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他和江西巡抚王守仁的学术观点非常相近。王艮对此感到高兴,说:“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

① 据说,五常冠:“纸糊为之,……仁义礼智信,皆天德也,亦见戴天之义”。深衣:“衣身二尺二寸,袂缘广二寸。裳前后共十二幅,裳前广寸半,与袂同。袖口尺有二寸,围之则二尺有四寸,缘广寸半。”绅经:“广二寸半,缙边布心,色同深衣制,头合纽处则系之以绦,用黄丝线为之,下与绅齐。”笏板:“书其上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出则持此,常目在之,须臾无忽之心也。”(上引均见《全集》卷一。)

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同上赵贞吉《王艮墓铭》)于是,王艮便动身去见王守仁,从水路乘船赴江西,九月抵达南昌。进城以后,他戴上自己做的纸帽子(五常冠),穿着稀奇古怪的深衣,手执笏板出现于街头,使得“观者环绕市道”(同上卷二《年谱》三十八岁)。王守仁“方坐高堂”,以为来了一个道人,于是降阶相迎,延入礼宾亭相见,请王艮上坐。王艮刚一见面,就搬出他未卜先知的神话说:“昨来时梦拜先生于此亭。”王守仁回答说:“真人无梦。”

王艮非常机敏,即反问道:“孔子何由梦见周公?”王守仁说:“此是他真处。”(同上)这里,王守仁并非反对梦幻神话,而是以“真人”来区别“俗人”,表示他对王艮的鄙视。王艮和王守仁自见面伊始,“便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及天下事”(同上),彼此论难。对于应该不应该议论天下国家大事的问题,他们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王守仁:“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王守仁:“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

王艮:“当时有尧在上。”(同上卷五徐樾《别传》)

按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语,出自《论语·宪问》:“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引范氏语云:“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王守仁所以引出这句话,是因为在他看来,象王艮这样毫无政治地位的布衣之士,是不应该去思考天下国家大事的,而应该象舜耕于历山那样,老老实实从事生产劳动,忻然自乐。

但是,王艮的看法不同。

他认为,正由于自己是草莽匹夫,更应当去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舜耕于历山,所以能够乐而忘天下,那是因为当时有尧在上。这里也就包含着一个反命题: